

智庫顧問吳易風教授訪談錄

■ 張林 云南大學經濟學院

66 为了记录历史、弘扬老一辈经济学家勇于突破的理论创新精神，编辑部特别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老一辈经济学家进行了访谈，记录下那一代学者求学治学的经历与他们对我国经济学建设的贡献。动态编辑部邀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林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教授进行了访谈。

99



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成长经历？

吳易風：我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临泽镇汲水村，家境贫寒，父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少年时代，我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1947年，我考取了离家有几十里路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家乡解放后，该校并入扬州师范，我也转入扬州师范初师部学习。1950年，我这时18岁，初级师范还没毕业，就被调到苏北行署机关学校当教师。不少学员原来是从农村参加革命的，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幸存者。他们大都在30岁左右。我跟他们在一起，既把自己当老师，也把自己当学生，特别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军队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需要培训。这一年，我被调入刚成立的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工作，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边学边教，认真备课。学员对我的教学效果还满意，我被评上了该校优秀人民教师。除了讲授语文课和历史课外，学校还让我讲“经济建设常识”课程。要教这门课，我只好自己赶快先学。先是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后又开始自学当时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一部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说老实话，当时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在此期间，我还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主要专业课程，并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取得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的毕业证书。

1955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外语课只教俄语，课程内容我过去几乎都学过了，于是便萌生了免修俄语的念头。后由吴玉章校长特批，经过考试，准予免修。俄语免修后，我在当时英语教科书奇缺的条件下，开始自学苏联版的英语教科书。在大学期间，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研读经济学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我当时还试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由于勤学苦读，大学期间各门功课全优，我曾获得吴玉章校长亲自颁发的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奖状。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69年12月，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中，不管白天劳动有多累，我晚上都要用来看书学习。在干校的3年中，我通读了当时已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还阅读了《资治通鉴》。在劳动之余，我一直坚持自学外语。当时带在身边的俄文版和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我最好的学习材料。

1972年，我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任教。但不久又被第二次下放，到北师大劳动基地劳动。在这里，我白天劳动，清晨和夜晚写作，认真修订了“文革”前写成的《空想社会主义》初稿，但该书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

197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后，除继续讲授经济学说史外，还开始讲授西方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课程。随着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涉及的数学也越来越深。我感到大学本科时学的高等数学远不够用，就虚心向身为北京邮电大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刘天芬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和她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名著《数理经济学》。1989年至1990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我到美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先后到过洛杉矶、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访问了南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等高校。这期间，除了与美国学者交流以及参加学术会议外，我花了大量时间收集和整理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相关资料。回国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论文，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与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

授在书评中认为，该书“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追踪考察，这在国内还是首创”。

除了翻译《数理经济学》，我曾主译《经济学百科全书》并校译几部经济学著作。2002年获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1995年，我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我以《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访俄报告，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我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了20年助教，后来升任讲师、副教授。1984年，经特批破格晋升教授，1990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張林：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是您的良师益友，您与高鸿业教授之间的情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佳话。我认为您与高教授数十年的情谊，也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与像您一样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之间关系的缩影。随着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不断离世，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湮没。可否请您借此机会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吳易風：十年前的5月17日，高鸿业教授在京逝世，学界失去了一位经济学大师，我痛失了一位良师、挚友和长期合作者。高先生1957年从海外归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到不幸逝世，正好半个世纪。我跟高先生从相识到相知，共48年的时间。跟高先生相处和合作共事，感受最深的是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赤忱的报国之心。这也是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共同的品质。

1956年初，高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受聘为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从半工半读的穷学生，到安定舒适的教授，生活变化很大，但是，高先生并不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而是决心回国。他想，如果整个生命都在国外度过，做“二等公民”，而不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工作，这将成为终生遗憾。1957年，他辞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副教授职务，回到祖国首都北京，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光明日报》报道了高鸿业先生返回祖国的消息。

高先生回国后，为祖国和人民辛勤工作了半个世纪，做出过很多贡献，但从不居功。相反，他说：有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羞愧，怀疑自己对祖国贡献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是否能补偿自己从她那里得到的报酬。高先生有很强的爱国心、报国心，又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他写的这首题为《龙套吟以明志》的七言律诗，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表达。

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高先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诸多帮助。高先生回国后，我经常向他请教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和英语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自学英语）。除高先生外，陈岱孙、陶大镛等先生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留校任教之后，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经济学说史》的编写。当时，我的任务是研究和编写空想社会主义部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有一定难度。为此，我虚心向老前辈陈岱孙教授和陶大镛教授求教。陶大镛教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的经验。

陈岱孙教授不仅向我介绍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经验，而且还为我修改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书稿。经过几年的刻苦写作，我在1965年完成了35万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书初稿。书稿完成后，陶大镛和陈岱孙两位老前辈又审阅了全部或部分手稿或清样，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令我十分感动，使我受益良多。

在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比如陈岱孙教授，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

博士学位后归国，教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也是西方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此后，他的论著表明他已成为一位理论功底扎实、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再比如高鸿业教授，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夜大系统听讲《资本论》导读课程，认真按照教学要求研读原著。《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他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准备了相当好的理论基础。据高先生自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美国读书和工作期间。当时的基本认识是，教授讲什么就信什么，书上讲什么就信什么，很少怀疑。那时深信凯恩斯主义，只对弗里德曼的那套理论有怀疑，认为他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对。高先生说：其实不只是我这样看，美国当时很多研究生都这样看。第二阶段是回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在读了《资本论》之后，感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评价最公正，对每个人的是非功过的评论都很全面，而且恰如其分。即使对马尔萨斯这样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他的错误时，也肯定他的有意味的个别论点。高先生说自己很想学马克思对他之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虽然他尽量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批判，但有时也不得不和许多同志一样，违心地使用贴标签的办法和骂人的话。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高先生说，在这一阶段，他和大家一样，思想解放了，不再违心地批判西方经济学，而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论西方经济学。

由于没有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理论上常常陷入混乱状态。他们在研究“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时，缺乏足够的抽象力，还不时地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他们在得出“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时，又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实现那种“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表现为两种资源配置：一种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一种是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劳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属于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

以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張林：您有一个“雅号”——“三通经济学家”。说的是您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同时还精通经济思想史。虽然事实如此，但这个“雅号”难免不够严肃。

2016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授予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我根据您的获奖感言，将您的学术身份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教育家。您不会反对吧？

吳易風：做学问的都知道，一门就很不容易，要努力一辈子，哪能通几门？对于有关我的各种溢美之词，我只能说“受之有愧”。

張林：那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进入您的学术世界。您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也是共识。《人民日报》说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光明日报》说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说您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阵地”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时报》说您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您取得的学术成就都得益于这种坚持。正如您所说：“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然而，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不断被边缘化，出现了许多误读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都带有论战性质。比如“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一文，针对的是是否“马克思经济学不研究资源配置”的观点？

吳易風：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至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资源配置说，一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说。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研究资源配置，从而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没有指导意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所得到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方式是《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生产关系是第二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不是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后再考察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将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从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力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虽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不能脱离生产力和实际劳动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把生产力或实际劳动过程作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由于没有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理论上常常陷入混乱状态。他们在研究“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时，缺乏足够的抽象力，还不时地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他们在得出“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时，又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实现那种“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表现为两种资源配置：一种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一种是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劳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属于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

以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張林：您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系列研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针对的自然也就是科斯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产权理论，以及“科斯有产权理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断语了？

吳易風：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一讲到产权理论，几乎都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科斯派或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这原不足怪。奇怪的是，我国的某些学者在讲到产权理论时，竟然也是如此，断言科斯有产权理论而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岂不知早在科斯以前100多年，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一些尊重客观事实的西方学者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的科学功绩，比如S.佩乔维奇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诺斯也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之相反，我国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只是因为在马克思部分著作中译本没有找到产权字样，便断言马克思只有所有制理论，而没有产权理论。事实是，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很多可以译为财产权或产权的英文词组：property rights, the rights of property等。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即使这些词组没有都译为财产权或产权，财产关系、财产权、产权等译名出现的次数也还相当之多。经检索，这三个译名出现的次数分别为：财产关系，74次；财产权，42次；产权，77次。

在社会科学史上，真正建立科学的产权理论的是马克思。无论同理论前辈相比，还是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家相比，马克思的产权理论都是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首先，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从而把握住了产权的本质；其次，马克思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财产权，考察了财产和财产权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并做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最后，马克思没有把财产权看作是单一的权利，而是看作是一组权利的结合体。财产的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所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财产权可以分解，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互相分离。马克思关于财产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学说，无论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下转03版）